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

讲好“一粒米”的故事

周飞亚

传承之光

作为五谷之一的粟，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人的主粮。脱壳之后的粟，即小米。近年来，粟的起源和传播路线，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课题，2023年还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小米年”。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是中国作物协会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的“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中国小米之乡”，也是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世界小米起源地之一。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从2014年起，敖汉开始举办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如今已成功举办了10届。一年又一年，众多国内外专家如约而来，聆听最新的考古成果，探讨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中国北方农业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为当地的小米产业支招献策。

在中国北方，很多地区都种植粟。敖汉的小米有什么特殊，能引发这样的关注？当地人总结为4个关键词：历史，文化，品质，故事。

种植历史延续近8000年

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兴隆沟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法获取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1500余粒，并经国内外3家碳14实验室测定年代，确定这些炭化粟黍距今约7650年。这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粟黍遗存，一经发现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旱作农业起源的外国专家认为，在大约6000年前，小米正是从这里出发，沿着草原丝绸之路向外传播。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能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离不开这一重要考古发现。考古队领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国祥介绍，尽管后来在北京东胡林等地出土了距今更久远的粟粒，但数量很少，且这些地区大都已不再种植小米，唯有敖汉的小米种植延续至今。

史前考古遗存赋予敖汉小米深厚的文化底蕴。敖汉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遗址就有4000多处，出土了许多重要文物，境内发现有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7种未出现断层的史前文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敖汉确定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猪首龙形象，探寻中华龙的起源，敖汉是一个重要

核心阅读

在中国北方，很多地区都种植粟。敖汉的小米有什么特殊，能引发这样的关注？当地人总结为4个关键词：历史，文化，品质，故事。

10年来，敖汉小米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成为全国“农遗良品”优选计划十佳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过100亿元，带动农民增收8亿元。2020年，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减贫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敖汉小米”成为考古工作反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区域。敖汉有500多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兴隆沟第二地点出土的陶人，第一次完整复原了红山文化陶人。”刘国祥对敖汉的重要遗址和发现如数家珍。而与此珍贵文物相伴的，是石锄形器、石耜、石刀、磨盘、磨棒等旱作农业所需所用的生产生活工具。这些遗存，见证着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可以说，正是旱作农业滋养了这些灿烂的史前文化。”刘国祥说。

“敖汉小米”成为考古工作反哺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敖汉小米的种植能延续至今，成为近8000年来大自然和先民的一致选择，必定有其缘由。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小米有什么独特优势？这些优势从何而来，又体现在哪里？

众多国内外专家合力推动了相关考古成果展示及研究工作，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问诊把脉。在专家的建议下，敖汉人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土壤条件、气候特点、小米成分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检测，实证了敖汉小米具有丰富的营养元素，找到其烹煮形态饱满和口感上佳的科学依据。敖汉小米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以检测数据为基础，敖汉与多个农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品种选育，发展良种繁育基地，保存濒临灭绝谷子品种92个，还对其中一些品种实施了太空育种。选育出来的优质品种，助力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生产模式的顺利推进，产量不断提高。全旗种植面积增加



图为敖汉小米博物馆。

敖汉旗委宣传部供图

至百万亩以上，行销全国。同时，敖汉加强数字平台建设，打造标准化追溯体系，力争让小米也有自己的“身份证”。

从原生态的粒粒小米，到小米油、小米醋、小米香皂、低聚肽粉、代餐粉等，不断开发的新产品，将具有乡土气的原料变成时尚美食和保健品、日用品，增加了产业附加值。

10年来，敖汉小米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成为全国“农遗良品”优选计划十佳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过100亿元，带动农民增收8亿元。2020年，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减贫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敖汉小米”成为考古工作反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约2/3以上在评选时都由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上报，包括敖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文指出，以敖汉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减贫模式，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探索了一条可行路径。

小小粟粒，“种”出一个博物馆

怎样讲好“一粒米”的故事？如何将小米打造成敖汉的文化名片？建造旱作农业主题公园，打造卡通形象“粟小贝”，广泛开展农耕记忆口述史发掘整理活动……诸多努力中，效果最突出的，莫过于建造敖汉小米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造型别具创意，像一个玉珏，环绕着中间3个陶罐，设计元素取自当地遗址出土的典型文物，既充满古朴韵味，又富有现代感。博物馆一建成，就成为当地的“网红”地标和旅游“打卡地”。小米博物馆馆长阮红梅介绍，不算旅游旺季，平时周末来博物馆参观的就有上千人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常常早上还没开门，就看见不少人等候在外面了。

展陈设计以强大的专家团队为后盾，布展方案六易其稿，精益求精。展览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小米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粟的起源与世界传播路线，粟在农耕文明形成发展不同阶段的地位作用，旱作农业与节气、历法、古代农书、古代仓储等。第二部分从科普的角度，阐释了粟在固碳、节水、适应性广等方面的特性及其对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重要意义，中国在小米起源、进化、病理、分子遗传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进展。第三部分展示了敖汉的旱作农业传承，展现了千百年来传统耕作方式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融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丰富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民俗。

“想不到我们经常吃的小米，有这么多知识点！”“这农具我家也有，竟然摆进博物馆了。”展厅里，观众们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几年来，阮红梅亲身感受着人们的态度和观念的变化。一座博物馆，大大增强了当地百姓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文化自信。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蝶变，仿佛中华农耕文明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近8000年前种下的一粒小米，其种子及种植延续至今，丰富了今天人们的餐桌，也让文明的魅力浸润在越来越多人的心间。

版式设计：赵德汝

黄河文化见证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

侯卫东

“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是黄河文化的精髓，“礼仪之邦”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

百年考古揭示，中华大地各区域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陆续进入文明的门槛，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考古发现的众多早期王权国家和区域文明大体同时衰落，只有在黄河中游，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夏王朝形成并壮大。此后的3000余年里，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嵩山河洛地区，长期作为正统王朝都城所在地。

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原腹地出现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持续进行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区域环壕聚落普遍流行并且规模明显扩大，如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等，环壕聚落的面积都在50万平方米以上。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河汇入黄河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有三重环壕，中心区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围护的多排大型房址组成的类似宫城的“宫城”区，有深厚夯土精心筑成的大型活动广场，呈“前朝后寝”的布局。同一时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西进，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北上，推动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和早期文明的形成。

公元前2800年以来，龙山文化形成城址林立的文化景观。中原腹地以夯土围垣为重心的中小型城邑广泛兴建，如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温县徐堡等，反映了区域社会整合的步伐在逐渐加快。公元前2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形成襄汾陶寺、神木石峁等超大型都邑，代表着区域聚落形态的新突破、区域社会组织的新模式。陶寺遗址，占地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等先后被发现，居民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而雄踞在陕北高原上的石峁遗址，由伟岸的皇城台、固若金汤的内城和规模宏大的外城等三重城垣构成，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乐器、陶器等。它们最终汇入中华文明起源的巨流之中。

中原腹地处于“天下之中”的区位，重农固本、兼利四方的发展模式，成为合理、有利的历史选择。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和探索，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呈现出路网和围垣界隔的多宫格布局，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是都邑的重心，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殿宗庙建筑成为后世宫室制度的先声，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开后世官营手工业的先河，诞生了铜玉礼器为代表的器用制度。二里头的面积虽然没有超过此前龙山时代的最大都邑，但出现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其体现的王都规划和器用制度等国家礼制更加成熟，都邑成为当时中华大地上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的城市。

夏商王朝形成了国家治理方式、王都营造理念、地方统辖策略以及宫室制度、器用制度、墓葬制度等礼仪制度。“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是黄河文化的精髓，“礼仪之邦”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商王朝晚期殷墟的考古发现中，成熟的甲骨文和金文成为传承至今的汉字的源头，这也是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纽带。

（作者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南京城墙砖窑遗址

金连玉



图为南京城墙局部。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供图

未发现火烧及烘烤痕迹。根据对裸露地表砖坯的测量，发现单块砖坯长约41厘米、厚约10厘米，与城砖尺寸基本一致。结合南京城墙上发现的“新城县”城砖及地方志资料，初步推断这一砖窑遗址属明代初期。此处为南京城墙营建烧制城砖的建昌府新城县砖窑，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南京城墙砖窑遗址。砖窑、砖坯晾晒地、古道路等，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南京城墙砖生产供

应链。除江西省黎川县外，南京城墙砖窑还在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有所发现。截至2023年，共发现砖窑遗址15处、窑炉近千座，基本勾勒 outlines 明初京师营建城墙时，城砖建材生产供应的盛况；基本可以确定，南京城砖主要产自明朝的直隶、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所属的府、州、县等，涵盖了长江中下游，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之境。

南京城墙砖多数带有铭文，大部分城砖上都记录了烧造地点。据统计分析，明代仅县一级的供砖单位就达174个，烧造地点北至淮安，南至赣州，东至南通，西至荆州，并凭借发达的水路交通，经长江、赣江、沅江、鄱阳湖、太湖、巢湖、洞庭湖、汉江等河流域，将各地烧造的海量城砖运至京师。

南京城砖使用量巨大，供砖地点众多，为便于统一管理，城砖烧造延续官营手工业中的“物勒工名”制度。每块城砖上，一般都记录有烧造这块城砖的府、州、县各级提调官的姓名，以及总甲、甲首、小甲等基层烧砖责任人和直接参与造砖、烧砖的匠户、窑户姓名。与这块城砖烧造有关的各级责任人姓名，均被书写或模印在城砖中，一旦城砖发生质量问题，就会自上而下问责府、州、县的各级负责人及基层烧砖人，形成严密的城砖产品质量责任制。比如，黄州府蕲州蕲水县城砖铭文记录的烧砖责任人多达11位，清晰详备。上至黄州府掌管城砖烧造的府提调官，下至最基层的烧造人的名字，生动展现了明代初期严密的城砖烧办制度，勾勒出地方基层组织造砖管理模式。南京城墙博物馆专门辟出展厅展示这些带有铭文的城砖，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由此发现很多生动的故事。

（作者为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研究员）

